

基于意识形态价值分析的学术期刊评价^{〔*〕}

○ 马立钊

(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安徽 合肥 230051)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我国意识形态呈现不断创新的历史趋势。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及其创新的评价内容包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维护在现阶段国际化语境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地位,实现现代文明社会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评价运行机制可以是学术共同体作为评价主体,遵循学术研究规律和期刊办刊规律,采取定性评价的方式。

〔关键词〕意识形态;学术期刊评价;评价内容;评价机制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0.012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具有两个属性,即客观真理性和意识形态性。该属性决定了这种产品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还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具有公共属性。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和机制广受学界和期刊界关切。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面临的困境,除了在于学术评价体系的量化数据评估之外,还在于学术期刊通过刊发学术研究成果所蕴含的意识形态社会影响力方面的评价。意识形态对于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评价的影响要素应受到期刊界和学界的关注。

一、我国意识形态创新的时代主题

“意识形态”一词系法国哲学家特拉西首创。在特拉西看来,意识形态被理

作者简介:马立钊,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界杂志社副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法学、编辑学。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学术创新与综合类社科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研究”(AHS-KY2015D132)的成果。

解为“观念的科学”，而且他首创该词的本意就是为了全面清算和批判封建神学和教会哲学思想。^[1]马克思承认作为“观念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是一门与人类精神活动有关的科学，明确地把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观念性构成部分。^[2]从意识形态思想史来看，意识形态的内涵有两个基本点：(1)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2)这种思想体系或信仰体系是特定阶级、社会集团对现存或构想中的社会制度进行解释、辩护或对某种社会制度进行批判、改造的理论体系。^[3]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意识形态类型区分方法：一种是国家意识形态，它以“法律体系”为特征；一种是宗教意识形态，属于“更高的”意识形态：“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宗教和哲学的形式”。国家意识形态使得国家具有神圣性或某些宗教性色彩。现代国家的“世俗化”过程，使宗教的神秘权威让位于民族国家的世俗权威，自然有一个“本体”的转移问题。恩格斯指出：国家给社会个人提供了现实的保障，“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所以国家本身具有一种神圣的精神力量，它“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4]在国家和社会分立的社会形态中，国家意识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是两种现存的存在形式。在社会治理良好的秩序环境下，国家和社会分享共同的意识形态价值，并能够相互促进发展、相互容纳彼此的价值错位。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亚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政治崇拜、信仰高尚。政党与国家关系，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衔接关系。在现代政党制度法治化的国家，执政党与国家意识形态具有分层性。意识形态的分类标准也具有不确定性。一般而言，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不具有同一性，但又具有一致性。

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且也受到宪法保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决定了国家意识形态与政党意识形态的同一性和一致性。自建国以来，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Legitimacy,即权威正当性,或权威在受治者中的可接受性)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8)以平均主义的理想作为合法性基础的计划经济时期；第二阶段(1979—2004)以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效,以及对经济发展、安全、富足与稳定的追求作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第三阶段,执政党需要意识形态转型,迈向一个新的台阶：从追求发展实效,转向对一个新的更具吸引力的全民族认同的信仰价值的追求。^[5]第三阶段是目前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创新发展的重要时期。创新和改革是当前时代的主题,也是意识形态转型的必要条件。转型和变革的时代,需要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共同参与并提供更广阔的价值存在空间。作为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创新,思想解放是核心源泉。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才有现在的改革开放,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创造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理论,为学术创新创制了自由的学术话

语空间。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为中国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设定了学识性条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必须关注中国当下国家和社会面临的特殊问题,也必须坚持执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方向,即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评价,并统领社会意识形态。在此前提下,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在国际科学共同体研究领域共享的语境下,参与国际学术讨论,分享国际学术界共同认可的学术研究成果。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创新及学术期刊的创新性评价无不包含着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国外如此,国内亦如此。学术创新的原动力来源于对人类自身的关爱,意识形态有助于这种关爱的社会化弥散,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的学术创新尤其如此。学术研究没有禁区,但学术创新性成果的社会传播和期刊传播研究成果的价值选择,应考量意识形态的正确导向以及创新发展的时代方向。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无产阶级是否取得意识形态领导权视为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取得社会领导权的标志和标准,是否能够主导社会动员的精神力量。在我国建国初期,即意识形态第一阶段时期,意识形态过度政治化,完全依赖国家(政治)权力强制推行,形成了一种依靠政治权威主导意识形态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模式,意图用政党意识形态取代国家和社会意识形态,使得社会大众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采取旁观态度,甚至产生言行不一的社会现象。一些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新闻报道、理论文章、文艺作品,由于意识形态理论文化话语的缺失造成了工具与价值的分裂,意识形态理论沦为纯粹的政治工具,失去对人的精神世界或者意义世界的关照。因此,缺乏人文关怀的工具性话语,失去了影响到社会成员的接纳的情感要素。^[6]现代意识形态建设进入第三阶段,哲学人文科学研究成果在关注人类命运和生活意义的同时,也责无旁贷地履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接纳的历史责任。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应该秉持创新、宣扬主流意识形态主阵地的精神和办刊取向,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将传播优秀学术成果视为倡导中国时代精神信仰的历史责任。

二、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意识形态的评价内容

学术期刊定性和定量的评价标准和方法,是期刊界和学界认可的综合性评价方法。在定性评价中,期刊的正确政治导向,包含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是期刊评价体系的要素之一。但如何进行定性评价,又因为缺乏定性标准而呈现量化倾向。许多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也往往取其量化因素进行分析,回避定性评价可能产生的争议。有学者对民族学期刊进行评价,选择期刊被引次数和被引速率两项大标准进行分析。期刊被引次数分解为:总被引次数、他刊引用次数和学科引用次数;被引速率可为总被引速率、他刊引用速率和学科引用速率三项分指标。影响因子细分一般影响因子、他引影响因子和学科影响因子。^[7]有学者对11种宗教学期刊基于CSSCI统计得到的2004—2006年统计数据为数据来源,从被引次数、被引速率和影响因子三个角度定量

分析评价了宗教学期刊的学术影响力。^[8] 这些评价方法能否反映出期刊意识形态的价值影响,缺乏直接的参考论点或逻辑论证方法。如何确定期刊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是定性评价的内容。定性评价内容的缺失,决定了对期刊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评价的内容体系的缺失。

我们现在的四大评价指标体系是借鉴美国期刊评价体系的产物,特别是SCI、EI、SSCI评价体系。美国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ISI)是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领域信息解决方案的企业及专业情报信息提供商,是一个文献检索服务的营利性机构。它采用纯商业性的企业化运营机制,主营其研发产品SCI、SSCI、A&HCI等引文数据库及期刊引用及评价排名结果(JCR)。它利用期刊和论文的被引用情况,在SCI上排出了各学科论文被引频次和各学科期刊影响因子排行表。^[9] ISI系列引文数据库是由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建立。作为出版公司,在向全球传播较高的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倾注了美国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容,如在选刊的语言、地域方面,限制非英语国家的研究成果的期刊的入选,不是直接表露出意识形态差异,而是通过文化的差异,排斥了非英语国家,特别是与美国具有意识形态竞争能力的国家的优秀期刊刊载的优秀学术成果的世界性传播。因此,我们在进行期刊评价时,必须关照本国文化意识需求和文化遗产的土壤。据此,笔者认为,在期刊定性评价的意识形态价值评价时,适度关照以下几个评价要素或因素:

首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文化是意识形态建构的土壤和根基,意识形态则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导向。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特别在文化深层次结构方面。西方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亦即是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因此,任何“变动”都导致不断超越与不断进步。^[10] 西方文化中的“个人”观念是其文化基础,个人的意识注入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在现代国际文化交流中,西方文化呈现出文化帝国的情感倾向,并希望其他国家的人们都能够接受、模仿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理念。而中国具有继承性的文化基础是“集体化”社会积聚,其外在表现即是国家强大于社会。在先秦时代,“天下定于一”以及“尚同”这一类观念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人的意识中。社会“和合”的条件是在政权与思想都“定于一”的条件下实行社会治理。社会主流文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是中国实现善治的基本规则。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目前需要的,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塑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以及一种立足于自己生活方式的经济结构。也只有如此,才能在全球化中立于不败之地。^[1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激活中华文化的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12] “不日新者必日退”,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13]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意识形态指导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承载现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载体和政治保

证,同时,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也是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亲和力、吸引力、凝聚力的民众基础。

其次是维护在现阶段国际化语境中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地位。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言说的权利”与“言说的权力”这样的双重意蕴。^[14] 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该国精神灵魂的体现,是民族精神信念、价值意识的根本依据,也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的情感导向。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不仅仅表现在对于大众生活方式的争夺,而且表现在学术争鸣、学术情感的表达方式中。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阵地,充分利用学术的力量和品格,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表达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力量,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体现,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释学术领域中出现的社会现象,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魅力,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统领多元的社会思潮的目标,进而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系中,获得自己应得的国际地位。

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关涉到一国之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总是被发达国家在各个方面包括学术研究、学术期刊所争夺。发达国家在学术研究方面,可能比发展中国家具有领先性,但其表现出的意识形态优越感也是突出的。从美国期刊引文索引技术的全球化推广方面即可看出这种优越感的现实存在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期刊评价结构体系的巨大影响。学术界和学术期刊界必须在寻求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视野下,重新认识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意义。虽然从经济全球化视角看,一国之意识形态功能必须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国或他人利益,“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自身安全”。^[15] 但是,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创新性话语权的竞争,仍然是软实力方面的国家竞争的重要一环。

第三是现代文明社会中国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创新。传统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权力统领甚至消灭社会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具有当然的统治性。和传统意识形态相比,现代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上层建筑的基石。现代意识形态具有以新国家制度建构为先导性、国家权力运作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合法性依据的特色。^[16] 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必须使民众思想观念超越现存的统治思想和统治秩序,为民众描绘未来的善良政治思维和谐社会图景,增强民众对现存国家主权和国家政权的自信心,维护国家现存政治秩序的社会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事业,并富有不断地随着时代进步而进步的理论生命力。

主流意识形态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决定了其能够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不断满足国家制度创新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的主要理论聚焦,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应当为意识形态创新提供理论源泉和实在载体。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固本”,“固本”的要求是创新,即随着中国社会实践的深入,创新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就是因为能够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国化具体形式,能够不断适应发展中的中国现实生活。从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可以看到,邓小平与执政党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所采取的基本战略,是通过意识形态作创造性的解释,从而发展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执政党意识形态新的话语系统,使革命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对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方针具有论证功能的、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话语。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保持了意识形态的历史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新时期政治路线的保护、辩解、动员与政治凝聚功能。^[17]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从废除阶级斗争为纲,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方式都是在不断创新中谋求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与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坚持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形态创新,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起始点和归结点。

三、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及其创新的评价运行机制

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及其创新是学术期刊定性评价的对象。定性评价方法以同行评议为主要核心。学术期刊定性评价确实存在诸多困难:组织困难,专家选聘困难,评价结果模糊包括评价专家意见模糊。^[18]评价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创新评价机制当然包括中国意识形态的创新评价内容。如何评价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创新,是期刊学术创新的一项根本任务。笔者认为,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创新的评价运行机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评价主体

学术期刊评价主体的问题,学术界和期刊界主张学术共同体评价,比较适应评价要求。有学者认为,学术的评价、学术的标准、学术上的分歧,所有学术上的问题只有依靠学术共同体才有可能得到解决。^[19]笔者也持此观点。学术期刊适格的评价主体应该是也只能是来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即学科专家与期刊编辑,只有他们才有可能代表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看法和立场,并选择最合适的评价方法,来对以为他们服务为宗旨的学术期刊作出科学公正的评判。评价机构或行政管理部门并不能因为其提供了评价工具或建立了指标体系或组织了某种评价活动而自动成为适格的评价主体。^[20]对于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而言,综合性期刊刊载学术研究成果的范围跨越多个学科和专业,学术共同体不可太偏狭于某一特定专业,尽力形成具有共同学术话语的学术共同体,构建学术期刊的评价平

台。

学术界和期刊界共同组建期刊评价主体的优势还在于,学术研究自有其独特的学术思维和学术境界,期刊也有其自身的办刊规律。对于学术研究和期刊创新,国家基本上秉持学术自由的基本态度,包括对意识形态的学术争论、学术争鸣,在法治与民主的基本社会价值观映射下,不会再出现改革开放前那种只看阶级地位和阶级观点,而不关注学术规律的乱政现象。学术共同体完全可以以学术研究内容和期刊载文学术价值为评价对象,扩展学术研究领域,做到学术研究无禁区。

在学术共同体作为评价主体的情况下,国家也不是完全放弃学术评价和期刊评价的权力,而是采取有利于学术繁荣和期刊繁荣的态度,鼓励学术创新和期刊创新。如全国社科规划办国家社科基金自2012年以来,先后资助了200家学术期刊,并实行动态退出资助机制,从政治导向、问题意识、选题策划、栏目建设、论文质量、学术影响、是否收取版面费、匿名审稿制执行情况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考核。另外,采取国家发布系列课题、政府对策研究课题等方式,引导学术创新和期刊创新。现在期刊评价机构也把刊发国家课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数量,作为期刊评价的参考数据。

2. 评价标准

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意识形态及其创新是期刊定性评价中最艰难的评价项,难就难在具体的评价标准难以设定。有学者认为,对学术内容的争议或对学术评价的争议,都应在学术界内部解决,而不应牵扯过多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21]笔者认为学术评价内容必然包含着学术研究体认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况且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本身也可能是某些学科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法学、伦理学等,只是不能把政治权力的目标性追求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作为学术评价的标准。现代任何国家在“知识经济”的语境下都重视学术创新,既认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学术研究价值,也鼓励学术界关注当下社会现实和社会治理的对策需要而进行的学术研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官方”之于学术创新的认识总体上并不积极,“百家争鸣式的学术创新者”,甚至会被施以“意识形态”上的政治迫害,这在“文革”中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基于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基础,官方对于“学术创新”表现出了浓厚兴趣。^[22]学术界也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学术创新”话题,尽力实现良性的学术创新机制。

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创新评价应在真正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统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思想的同时,容许“新自由”非主流思想的存在,正确解决马克思主义思想独立与思想包容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思想“独立”必须高于思想“包容”。只有思想独立,才能拥有思想阵地,才能获得认同、凝聚共识,才有可能去“包容”。^[23]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是不断汲取新知识、新思想而不断发展创新的体系。在坚持思想独立的同

时,应该包容新思想,扩大对新思想的容忍度。独立与包容的关系不是先后关系,而是时间上同时、空间上并存、指导社会思潮主流与支流的关系。意识形态固然具有群体性和阶级性,但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绝不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它应具有普适性和包容性。^[24]这是由我们富有多样性民族文化的共存共生、国家和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重新审视和提倡“纯知识观”的学术价值显得十分必要。由于学术创新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讲,乃是一种学术内在价值以及知识人内在生命力、创造力的呈现,这就意味着学者要从内在的理路去进行学术创造,过于看重学术的外在价值反倒不利于学术创新的开展。^[25]

我们要警惕文革式的仅仅以阶级地位和阶级结构为标准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由于中国意识形态创新模式的时代独特性,即通过保留旧意识形态的符号,而使之具有新的内涵的方式来达到意识形态发展,原有的意识形态符号的保留,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经由旧的思维习惯,自觉或不自觉地激活反对改革开放方针的旧的思维逻辑,并进入使左的价值死灰复燃的“路径锁定状态”,在新时期意识形态创新与发展过程中,左的意识形态路径依赖可能出现,并且有可能使左的意识形态与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再次死灰复燃。^[26]因此,在设定学术研究和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及其评价标准时,我们仍然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性思维,即只要有利于体现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体现社会民众共同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功能的社会实践,就是学术期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坚持和发展。

3. 评价方式

每一份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都有自己的选题范围和刊文标准,体现出期刊的审美倾向和办刊风格。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意识形态及其创新的意图通过期刊载文体现出来,因而,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意识形态观念都体现在各自选文的标准中。意识形态的评价方式是定性评价,但也不排除定量评价所折射出的期刊意识形态意图的表达,如在某一时期内,期刊载文引文数据可能反应了期刊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目的,特别是新期刊、进步期刊,可能更具有学术创新的功利性冲动。我们在评价方式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期刊意识形态的选择方式,在语言、文化、地域、作者广泛程度等方面,体现期刊意识形态的创新追求。

期刊价值导向是期刊的根本。它的政治方向是最重要的。^[27]学术共同体对期刊意识形态及其创新性评价,应当明确评价意见,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自觉服从学术研究规律和期刊办刊规律,正确进行评价。这有待于学术期刊评价实践进行检验。

注释:

[1][6]胡伯项、刘东浩:《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理论的文化话语转换》,《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第86、83页。

- [2]吴胜锋:《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辨析——基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解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7页。
- [3]黄新华:《当代意识形态研究:一个文献综述》,《政治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58页。
- [4]尹保云:《现代化意识形态发展的模型》,《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第65页。
- [5][26]萧功秦:《从转型政治学看中国意识形态创新的特点》,《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第135、135页。
- [7]鞠秀芳:《民族学期刊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4—2006)》,《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9期,第70—77页。
- [8]胡媛师:《宗教学期刊学术影响分析——基于CSSCI(2004—2006年)数据》,《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75—80页。
- [9]李爱群:《中、美学术期刊评价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图书馆博士论文藏书,2009年,第93页。
- [10][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 [11]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12页。
- [1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1页。
- [13]人民日报评论部编:《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247页。
- [14]聂筱渝:《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基于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审视》,《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3期,第70页。
- [15]邢丽菊:《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的传统文化内涵》,《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3期,第107页。
- [16][23]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历史转型及其当代挑战》,《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2期,第5—6、5—6页。
- [17]萧功秦:《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创新的历史考察》,《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46页。
- [18][21]臧莉娟、葛星:《学术期刊定性评价的尴尬与困顿——基于四种主要期刊评价体系》,《评价与管理》2016年第4期,第6、25页。
- [19]朱剑:《重建学术评价机制的逻辑起点——从“核心期刊”、“来源期刊”排行榜谈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2页。
- [20]马立钊:《学术创新与期刊评价标准》,《贵州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第166页。
- [22][25]徐永:《国家行动下学术创新策略的实践逻辑及其反思——基于大学学术生产的视角》,《教育发展研究》2012年第23期,第2、6页。
- [24]孟浩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的价值原则与目标指向》,《理论前沿》2007年第24期,第31页。
- [27]李海燕:《内蒙古社科期刊评价体系构建探究》,《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55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